

苏联的 稳定和变迁

〔美〕塞维林·比亚勒著



新 华 出 版 社

381
E82
188

苏联的稳定和变迁

〔美〕塞维林·比亚勒 著

普尔 译 方辉盛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CICIR 042361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by Seweryn Bialer

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年版译出

苏联的稳定和变迁

〔美〕塞维林·比亚勒 著

普尔 译 方辉盛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出 版 社 发 行

新 华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94,000字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57 定价：1.10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塞维林·比亚勒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同时又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他长年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著有《当代激进主义》、《苏联外交政策的国内背景》等。

本书是他的最新著作，1980年出书后，他在1981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长文，申述本书观点。美国有些学者名流如霍夫曼、舒尔曼（国务院关于苏联问题的特别顾问）等对此书推崇备至。因而，它在美国学术界乃至决策者中都有相当影响。

从治学态度说，作者代表了西方苏联问题研究中比较客观和翔实的一派见解。他从资产阶级较长远的利益出发，力图联系历史沿革和国际斗争的背景，全面地考察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试图摸清苏联的强大和虚弱之点。

他断言，“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可能要以一个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过去无法匹敌、而且在可能预见的将来也无法匹敌的时代，载入苏联史册。”他认为，这个时代是苏联

历史上政治最稳定的时期。它巩固和加强了工业大国的地位，军事上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特别是，人民生活有迅速提高。

作者在分析苏联政治稳定时，除上述因素外，还描述了有助于稳定的各种“社会进程”；涉及苏联人心思定、政策放宽、体制改革、消费基金比例的提高、农业的优先发展、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科技革命、社会科学管理等等。也包括经济效益差、技术落后等消极因素的影响。对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农业上的得失，苏联的干部选拔、社会流动和民族问题，作者都有自己的分析。

作者分析了苏联对外关系上的成败对其稳定的影响，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和限制；分析了苏联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的观点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趋势；指出“苏联军事实力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资源的不平衡”；侧重谈到了苏联的苏美中心论、军事因素的作用及其关于缓和的观点等。

书中以较大篇幅探讨了举世关心的苏联领导迫在眉睫的交接班问题。作者结合历史分析了这次交接班的特点和意义，勾画了新一代可能的接班人的轮廓和两代人的特征，同时指出了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将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他推测“苏联领导在交接班斗争的纠缠中必须就国家资源分配、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计划和刺激等方面作出困难的抉择”。他还分析了可能行得通的经济改革的类型和未来变革的条件。

当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苏联

的，他的某些观点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固有的阶级偏见。诸如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化为超阶级的“民主制度”，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诬之为“极权制度”、“专制制度”如此等等。不过，本书还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论点，对于研究苏联问题，对于研究西方学术动向来说，都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探索。

本书原包括五部分，十五章。为节省篇幅，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删去了第一部分（共包括三章），对其余部分和作者的《导言》也作了一些删节，同时对原书“部分”和“章”的目录顺序作了相应的改变。原书脚注甚多，我们仅选择了其中有实质性内容或有具体材料部分，其他均从略。书中除少数注有“译者注”字样为译者所加外，其余未注明者均为原注。

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

序 言

这本书是作者在一九七八——七九学年哥伦比亚大学休假期间，用十五个月的时间写成的；但是，酝酿的时间就长得多了。本书综述了斯大林主义之后苏联制度的演变。成书之前，作者曾对苏联进行过二十年认真的研究；定期地阅读过苏联的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报告；同苏联大学师生和官员、移居外国者进行过无数次谈话；并且同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同行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

对本书撰写的赞助，一部分来自苏联和东欧研究委员会，它为此拨了一笔补助金，一部分来自纽约的勒尔曼研究所，它拨了一笔研究员基金。我深切感谢勒尔曼研究所和它的执行所长尼古拉斯·里佐波罗斯，他不仅提出让我休假和研究，而且特别是，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作者所能指望的最有激发作用的学术环境。勒尔曼研究所举办了多次座谈会来分章分节讨论我的原稿，这使我得益匪浅。我感谢所有参加那些会议的人。我特别感谢罗伯特·利格沃尔德博士、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博士、罗伯特·凯泽先生和迈伦·拉什博

士。不用说，最后定稿上所表达的看法和观点由我个人负责。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对我提供了经常的支持。我非常感谢我的行政助理彭尼·伊，感谢我的孜孜不倦的助理研究员辛西娅·罗伯茨和迈克尔·克莱切斯基，他们在我的研究和写作的所有阶段都进行了协助。我也要感谢帮助校对的凯恩林·道奇森和制订索引的迈克尔·克莱切斯基和理查德·科夫曼。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琼。尽管她有自己繁重的业务工作，她还是乐意而慷慨地运用智慧和逻辑提供了友好、忠实的批评，细心地关注了全书的结构和风格。没有她坚持不懈的、耐心的鼓励，没有她的帮助，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塞维林·比亚勒

马萨诸塞州温德尔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日

导 言

苏联历史中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行将比它开始时更富于戏剧性地结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对阿富汗的入侵，毫无疑问会比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缓和以来的任何一起事件都更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局势，特别是影响到美苏关系。的确，这一事件已经使缓和进程停顿下来，甚至发生了倒退。同时也暴露出，美国和苏联对缓和的基本规则各有各的解释，会产生何等严酷而危险的后果。这个事件发生在本书向出版社交稿几周之后，但是，在本书开宗明义的地方简单地谈一谈这个事件，倒是很合适的。因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们了解这个事件和其他国际事件提供较为广泛的来龙去脉，使人清楚地看到苏联的观点和行动的变化。

苏联作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有种种设想作根据的，我们必须从中找出这次入侵的幕后原因。苏联人所面对的前景是，他们可能失去自己对一个友好而不稳定的邻国政权的脆弱控制，这个政权很可能被伊朗模式的好斗的穆斯林共和主义所征服。苏联领导人固然担心军事行动可能带来危险的反

响，但他们更担心的是怕苏联共产主义失去那个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国家。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苏联领导人是在仓卒之间作出他们的决定的，他们没有现实地预见到美国可能的反应，没有预见到同美国的关系会受到何等的长远影响。但是，根据我们对苏联决策过程的了解，我们决不能相信这样的话。这样一种决定只能是精心思考和处心积虑地作出的。它标志着苏联在观点和行动上发生了重要的改变。^①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成了苏联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苏联人已经选择使用直接军事干涉的新手段，来谋求实现向国外扩张政治权力的老目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是苏联第一次在它得到公认的势力范围之外动用大量的军事部队。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举动，显示出苏联自命不凡、刚愎自用和扩张主义的冲劲达到了新的程度，以致西方联盟有必要对国际局势作出重大的重新估价，并采取有效的反措施。过去的十五年期间，苏联已经达到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且取得了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国际政策已经表明，它最关心的

^① 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次入侵在苏联行动中并非新事，它不过是苏联在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他们说，结果改变了的只是西方对苏联政策的看法，特别是那些没有料到苏联这一步的人的看法。我认为，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不仅意味着西方对苏联政策的观点的重大改变，而且意味着苏联的观点和行动的重大改变。

一件事是：怎样成功地把新的军事力量转化为国际上有效的政治权威和影响，同时又避免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如果说在过去几年，苏联的行动已经走得越来越一意孤行和富有危险性的话（苏联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也门进行冒险，以及使用军事上的代理人等等就是证明），那末，当时这种行动还是受到一项主要的优先考虑的制约，那就是：既渴望进行国际掠夺又担心同美国发生大战或危险的冲突，在这两者之间要掂量掂量。入侵阿富汗一事则清楚表明克里姆林宫的优先次序以及决定这种次序所依据的设想，有了改变。它显然表明苏联思想中某些似乎固定不变的设想已被摒弃了；如苏联过去认为，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进行合作会大有所得；如果苏联的行为超越了某些未加说明但是非常心照不宣的界限，对美国的反应就得大大担心等。

分析苏联国际行动的人们已习惯于重复一句口头禅：苏联领导人通常只进行风险小、代价小的行动。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根据克里姆林宫自己的看法，在阿富汗采取的行动也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但是，如果这样，那苏联人就对“风险小”和“代价小”的含义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了。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是苏联对国际局势、对苏联扩张的风险和代价进行了重大的再估价的后果。

苏联领导人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这个节骨眼上选择修改他们的设想，调整他们的优先次序呢？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中心问题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的确，多年来，学者和分析家们一直无可非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勃列

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策的这一起一起的事件、问题和方面上。他们的著作常常是卓越的，这些著作逐渐积累起来，于是就做好了准备，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对苏联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项迫切需要上：那就是要有一个全面分析，即对斯大林去世后的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特别是同勃列日涅夫统治有联系的年月里，苏联政治的结构和进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要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总的看法。这样一种全面的分析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目前趋势和各项决定的理解；而且还会帮助我们把我们最近若干年来所获得的关于苏联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知識，应用于预测这个制度今后十年大致的方向。本书试图满足这一需要；其主要任务是分析苏联的领导、苏联的稳定和变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读者对象首先是各院校研究苏联的学员、政府和政治界与商业界人士；同时也针对那些想深入了解苏联行动的内在根源的一般读者。

本书研究苏联的全国性领导和最高骨干人物迫在眉睫的继承问题。将分析这一继承问题的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已在它目前的准备阶段被觉察到了，而且可能对要求继续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的现存压力起催化作用。

本书涉及在八十年代前夕估价苏联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这一核心问题。我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在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制度所显示的稳定在多大的程度上只限于领导范围；这种稳定是否同时也是苏联制度的其他方面和范围的特征，是否的确是整个制度的特征？还将讨论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外交政策的趋势，以及影响到决策者们对解决国际问题的态度的各种观点。特别要集中讨论美苏关系在苏联决策中的中心地位、苏联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军事力量的看法以及苏联对于第三世界的动乱所产生的扩张机会所持的态度。最后一部分我将研究苏联一些国内问题的规模和性质，这些国内问题很可能产生一种压力来促使在八十年代进行超出最近二十五年来制度性改造的变革。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继承和苏联骨干的更替.....	(1)
第一章 即将到来的继承：最高领导人.....	(7)
第二章 即将到来的继承：领导和骨干的更替.....	(22)
第三章 即将到来的继承：代际变化.....	(44)
第二部分 苏联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程度.....	(80)
第四章 稳定：几点分析.....	(80)
第五章 苏联的稳定及其根源.....	(94)
第六章 苏联的政治稳定和合法性问题.....	(152)
第七章 苏联的稳定和民族问题.....	(187)
第三部分 苏联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及其外交政策	
动向.....	(216)
第八章 美苏关系的核心地位.....	(220)
第九章 军备竞赛和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	(230)
第十章 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247)

第十一章	第三世界和把力量转化成影响……	(265)
第四部分	八十年代的前景……	(279)
第十二章	紧缩政治……	(279)

第一部分

继承和苏联骨干的更替

苏联现在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领导和骨干继承问题。它的最重要的方面将是在八十年代从斯大林主义的一代骨干向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一代骨干转手。就这个意义而言，斯大林主义之后的时代很可能即将结束。

“继承”这个词，当它用于现代政治现象的时候，就其最确切的含义而言，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接替政治职务的秩序和状况，以及这一接任过程对一个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个词也可广泛地用于整个领导集团，甚至最高骨干阶层；那么，对苏联来说，它就特指从最高领导人（一般是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或总书记）去世、撤职、（或可能的）退休，到一个新领导人的权力地位加强和巩固期间的政治生活格局和这种格局对政策的影响。

这种说法设想，苏联的制度需要并且总是产生这样的最

高领导人。不过它并不暗示这样的领导人能够拥有多么大权力。的确这一继承过程的格局本身，对这个新出现的领导人将取得的权力和影响的范围以及类型来说，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在苏联各种资源都集中化的情况下，决策权的集中于中央，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高度组织化的特性及其巨大的规模就使得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十分可观，因而使他通过继承而当选的进程就变得非常重要。

为什么继承这个问题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如此重要，同时那些当事人和局外观察家对此作出评价和分析又是如此困难呢？这里有种种原因。人们事先没有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应该多长。他们也没事先规定任职期间前任和后任所拥有的性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影响的范围。最高领导的任职者让出自己职位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标准。而最重要的是，选择新领导人的程序，以及这个新领导人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比之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军事专制政权更难以预测，更不确定得多。苏联这个国家本来在它“正常”时期的运转就带有难预测和不确定的特性，而在选择新领导人和巩固其地位的形势下，这两个因素在整个政治进程中就显得尤其难以预测和不确定了。

这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最高领导机构内部发生个人和政策的深刻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的可能性更是增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领导集团本身，以及上层骨干和机关内的人事更迭的倾向加强了。继承的程序和冲突的解决的不确定，各级机构权力